

※ 學林誌傳 ※

王叔岷與傅斯年 ——近代一對另類的師徒典範

胡開全*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東聊城人，近代著名的歷史學家和學界領袖。王叔岷(1914-2008)名邦濬，字叔岷，號慕廬，以字行，四川成都人¹，是傅斯年唯一帶過十年的弟子，當代著名的校讎名家、莊學泰斗。這對師徒在近代中國，關係另類：傅斯年外向且名聲在外，王叔岷內斂且不事聲張²，但二者動靜相宜；傅斯年學問和思想宏大，王叔岷的學術著眼於瑣碎問題，他們卻各領風騷；傅斯年對王叔岷影響深遠，王叔岷對恩師情感綿長，並堅守校勘專業。二人的成就皆可永載史冊。他們合在一起，締造了一個師徒關係的傳奇，為人稱道。下文分別從學術事業、生活細節、情感緬懷與繼承三方面來勾勒他們的師徒關係。

一、學術上的提攜與堅守，但二人寡言語

世人皆知，傅斯年學術功底深厚且大氣磅礴，王叔岷的感受也不例外。王叔

* 胡開全，成都市龍泉驛區檔案局（館）館員。

¹ 王叔岷先生通常自稱是四川簡陽人，當他於一九九二年返鄉時，才知道出生地洛帶鎮已於一九七六年劃歸成都市龍泉驛區，於是又改口了。王叔岷：《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2。

² 比較全面介紹王叔岷的文章僅見於鍾彩鈞：〈王叔岷先生學行簡述〉，《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卷第3期（1991年9月），頁79-84，後轉載於杜正勝、王泛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年），頁811-818。以及胡開全：〈校讎名家 洛帶鄉賢——歷史語言學家王叔岷先生事略〉，《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頁40-43。

岷第一次見傅斯年的場景，就傳為學界美談。「我第一次見到傅先生，將寫的詩文呈上，向他請教，他說說笑笑，學識之淵博，言談之風趣、氣度之高昂，我震驚而敬慕；我又奇怪，傅先生並不老，怎麼頭髮都花白了！（那時傅先生才四十六歲）既而傅先生問我：『你將研究何書？』答云：『《莊子》。』傅先生笑笑，就背誦〈齊物論〉最後「昔者莊周夢為蝴蝶」章，一付怡然自得的樣子。傅先生忽又嚴肅地說：『研究《莊子》當從校勘訓詁入手，才切實。』怎麼研究空靈超脫的《莊子》，要從校勘訓詁入手？我懷疑有這個必要嗎？傅先生繼續翻翻我寫的詩，又說：『要把才子氣洗乾淨，三年之內不許發表文章。』我當時很不自在，又無可奈何，既然來到研究所，只得決心下苦工，從基礎工夫研究《莊子》。隨後傅先生贈我《四部叢刊》影印明世德堂本《南華真經》一部五冊，卷末附有孫毓修《莊子劄記》暨校勘記一卷」³。

這次見面，傅斯年看似簡單布置了研究任務，實則有暗合自己心意的觸動，因為「他曾經計畫寫一本書專論先秦諸子文獻的演化」⁴。而且，「他認為清代考據是中國學術中唯一充滿了科學精神和邏輯推理的一個分支」⁵。王叔岷被傅的氣勢所征服，從文學派轉為考據派⁶，開始了真正的學術生涯。後來有人如此評價：「或許，從五四時期走過來的傅斯年瞭解到學術的需要，尤其在那浮躁的抗戰時代，張揚的性格無疑是一種陷落，才子氣的自恣，實無助於學術的深耕，特別在『整理國故』這塊領域，『辨偽』的工作極之重要，故服膺於歷史知識客觀性，並奉德國史學大家蘭克 (Leopold von Ranke) 為圭臬的傅斯年，對考據中的訓詁和校勘等關於文本研究，無疑非常重視。因此不論是『偽書』、『偽事』、『偽字』、『偽句』，都必須在辨偽的方法下，尋索與還其原初。而『整理國故』的背後，實是『國族計畫』(nationalist project) 的一部分。是以需要相當人手，而王叔岷老師考上北大文科研究

³ 王叔岷：《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頁 47-49。

⁴ 〈先秦文籍的演化〉作為一個題目出現在「傅斯年檔案」1-433，一九二六年末的一則筆記，檔案藏於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⁵ 傅斯年：《傅斯年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頁 1456、1459。

⁶ 王叔岷曾自述：「我在四川大學中文系讀書時，同學間分兩派，即考據派與文學派，互相輕視。考據派譏諷文學派空疏，不踏實。文學派譏諷考據派呆板，無才情。我是屬於文學派的。」王叔岷：《辭讎學 辭讎別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 2。

所，剛好也就被納入到這一學術計畫中來。」⁷

從此，王叔岷在李莊北大文科研究所，得傅斯年之鼓勵愛護，以校勘訓詁為基礎，博覽群書，廣輯資料，漸入學術之門。王叔岷在板栗坳讀書近兩年，頗下苦功，有所進步，其資質和治學的態度也被回來坐鎮李莊的業師傅斯年先生所洞悉，師徒二人逐漸建立起情同父子的師生感情。「傅先生在北大，不知何人贈送他影印日本高山寺舊鈔卷子本《莊子》七卷，趁大彩師母回南京，轉送給我。史語所原僅存〈庚桑〉、〈外物〉、〈寓言〉、〈說劍〉四卷，餘〈讓王〉、〈漁父〉、〈天下〉三卷，岷只參考日本狩野直喜《校勘記》。《校勘記》頗多疏漏。得傅先生所贈影卷，急寫〈莊子校釋補遺〉。傅先生在百忙中不忘關照學生，令岷感戴不已，更不能不激勵於學術矣」⁸！一九四七年夏，史語所以重金洽購江安傅沅叔⁹先生所藏南宋蜀本《南華真經》十卷¹⁰，是由傅斯年先生操辦的，這就是後來學界傳說傅先生用金條購宋版《莊子》，供王叔岷專用的淵源。王叔岷見到這個本子後，又專門寫了一篇〈南宋蜀本南華真經校記〉。傅斯年的指導和幫助，與王叔岷的勤奮結合，誕生了駁倒劉文典的《莊子校釋》¹¹，之後陸續還有開先河的《莊學管窺》和集大成的《莊子校註》共三本關於《莊子》的著作，加之他長期開設《莊子》課，使之成為在臺灣和東南亞享有美名的「莊子專家」。

由於傅斯年事務繁忙，王叔岷與他之間話語並不多。但王叔岷旁觀多了，被感染得也深。「傅先生規定，請假離所如超過半月，一定要歸還所借的書，以免妨礙別人參考。所中一張稿紙，也不能隨使用。上班時間，同仁如去閱報室看報，傅先生也故意去看，同仁便悄悄回到研究室去了。傅先生常到各研究室，問問各人研

⁷ 辛金順：〈消失了的青山還在——悼念王叔岷教授〉，《聯合早報》第38頁，2008年9月19日。

⁸ 王叔岷：《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頁263。

⁹ 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別署雙鑿樓主人、藏園居士、藏園老人、清泉逸叟、長春室主人等，現當代著名藏書家。四川江安縣人。光緒二十四年(1898)進士，選入翰林院為庶起士。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至「五四」運動前，曾入內閣任教育總長。傅氏一生藏宋金刻本一百五十種，四千六百餘卷；元刻本善本數十種，三千七百餘卷；明清精刻本、抄本、校本更多，總數達二十萬卷以上，是晚清以來繼陸心源皕宋樓、丁丙八千卷樓、楊氏海源閣、瞿氏鐵琴銅劍樓之後的又一家。他無論是在藏書、校書方面，還是目錄學、版本學方面，堪稱一代宗主。

¹⁰ 王叔岷：〈原序〉，《辭讎學 辭讎別錄》，頁15。

¹¹ 肖伊緋：〈劉文典落選中研院始末——兼及王叔岷「評劉文典《莊子補正》」〉，《中華讀書報》第14版，2013年6月26日。

究進度，並提出意見。每兩周規定輪流一次演講，有他參加，演講者都有些緊張。他一發問，便抓著要害，往往幾年才得到的結論，被他一問，就發生動搖，甚至推翻。他思想的銳敏，的確驚人」¹²！

到了做人生重大抉擇時，師徒二人的直接對話雖然不多，但由於彼此相知甚深，意見往往不謀而合。比如兩次事關王叔岷前途：第一次是關於到大學教書還是留在史語所，王叔岷的態度便很堅決，願意追隨傅孟真師。這在其父親的信件中表現得很清楚，「傅孟真師既器重吾兒，聘書兩類，吾兒擇處」¹³。因為當時正值大量西遷入川大學師資缺乏之際，已經有高校前來史語所與王叔岷聯繫，但王叔岷拒絕了，即其父信中說：「前函所云大學教師，自當不預聞矣。」¹⁴同時，王叔岷「狷介」的性格，也讓他更喜歡史語所這種持「批判政府的高貴道德立場」，並堅信「為了確保中國有一個更光明的未來，應該賦予文化和學術工作更重要的地位」，從而「不關心社會需求——如果不是政治現實」¹⁵的氛圍。後來傅聘王到臺大教書，就順理成章了。第二次關於是否去臺灣，則有生死抉擇的意味。「時局緊迫，傅先生邀請研究院各所所長，徵求去留意見，謂『史語所決定遷臺灣，如諸位先生同意去，交通工具我願意負責』。當時政府希望渺茫，各所拒絕遷徙。傅先生然後約見所中同仁，謂『到臺灣前途如何，不可預料，不得已時可能蹈東海而死。你們人口多的不必去，我恐怕關照不了，無法承擔』。問我：『你呢？』我說：『我回四川，不能回四川大學教書；回家鄉，帶著妻女只有累父母。』」¹⁶僅僅一句「你呢？」就讓王叔岷跟著傅斯年去以身涉險。

第三次是關於作序。傅孟真先生作為業師，仍然有將弟子「扶上馬、送一程」的心思。王叔岷當然明白老師為自己第一本著作作序的意圖和可能產生的作用，但他明確拒絕，而且連續拒絕了兩次，這並不影響師生二人的感情，卻被學界傳為佳話。「傅先生處理所務之暇，邀我去談談《莊子校釋》出版的問題，首先要我加上標籤，那些重要的創見給他看看，我標出的還不少，傅先生點點頭，然後說：『我跟你寫篇序，好不好？』我遲疑一下，說：『不必。』隔幾天傅先生見到我，又

¹² 王叔岷：《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頁 56-57。

¹³ 王叔岷編：《簡陽王耀卿先生遺稿》（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中的〈與子書〉第三。

¹⁴ 同前註。

¹⁵ 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頁 184。

¹⁶ 王叔岷：《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頁 69-70。

說：『我跟你寫篇序，我跟你先商量如何寫。』我依舊說：『不必，我自己負責。』傅先生愛護學生，顧慮年輕人的著作無人注意，所以才一再說跟我寫序，我當然感激之至。但是我想，一方面我的著作，好壞應由自己負責，不必要前輩誇讚；一方面《莊子校釋》是我第一部從事樸學的嘗試之作，萬一錯誤過多，豈不累及前輩。所以我不敢接受。最難得的是，我兩次拒絕傅先生，傅先生不以為忤，並即推薦《莊子校釋》給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¹⁷。《莊子校釋》出版後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因為其最後一冊直接針對了早已成名的劉文典。特別是鼎鼎大名的胡適先生，他曾在〈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的國學書單中推薦過劉的《淮南鴻烈集解》，而出版《莊子補正》時，著名學者陳寅恪為其作〈序〉曰：「然則先生此書之刊佈，蓋將一匡當世之學風，而示人以準則，豈供治莊子者必讀而已哉。」¹⁸胡適專門寫信來質問，王叔岷恭敬地回信辯解¹⁹。結果《莊子校釋》經學人閱讀後，廣受好評，成為劉文典落選首屆院士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九四八年底，王叔岷跟隨傅斯年到臺灣，除了在史語所繼續做研究外，還開始了在大學的教學生涯。「年初，傅先生邀李濟之、董作賓、勞榦（貞一）諸先生及岷，分別在臺灣大學文學院考古系、歷史系、中文系教書，與史語所合聘。屈萬里（翼鵬）先生暫任總務處文書主任，後亦轉至中文系執教」²⁰。

傅斯年要求王叔岷為中文系講授最為關鍵的「大一國文」²¹，「傅先生認為學生剛考進大學，最重要的是提高他們讀書的興趣。他非常重視大一的教師和教材，要最有經驗最熱心的教師教大一國文。教材規定《孟子》和《史記》，《孟子》全

¹⁷ 同前註，頁 63-64。

¹⁸ 劉文典：《莊子補正》（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的陳寅恪所作〈序〉，這裏並不是說陳寅恪判斷有誤，他在〈序〉裏說過：「寅恪平生不能讀先秦之書，二者之是非，初亦未敢遽判。」時間是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當時王叔岷先生的《莊子校釋》尚未打腹稿。

¹⁹ 耿雲志：《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第 23 冊。

²⁰ 王叔岷：《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頁 76。

²¹ 陳平原：〈學堂不得廢棄中國文辭——關於重建大一國文的思考〉，《語文建設》，2012年第 17 期，頁 10-13 中有「為全校學生開設『大一國文』，這本是老北大的傳統，傅斯年將其帶到了臺灣，至今仍枝繁葉茂。最近十多年，臺灣大學校方曾做過多次全校性教學評鑒，『大一國文』平均值遙遙領先其他科目，成為最受學生歡迎的共同必修課」。另據筆者到臺大實地考察，「大一國文」在所有課程中占比重非常大，上、下學期每週各三個小時，共計六個學分，超過很多專業課。

教，《史記》選教」²²。「中文系開課程會議時，傅先生也參加，要我在一年級教一班國文」²³。據筆者到臺大獲得的口碑資料，與王叔岷同到中文系，但關係並不密切的董同龢親口對楊承祖說：「王先生教我們臺大中文系的大一國文，貢獻巨大。很多人上了王老師的大一國文，就不會想轉到別的系去了；甚至有人旁聽了以後，就轉到我們中文系來了。」²⁴關於「大一國文」的重要性，傅斯年曾叮囑當時中文系主任臺靜農，「國文不但是大一學生的語文課程，同時還應該是大一學生的人格修養課程」²⁵，有點因應時局變化，強調文章之外的氣節與氣勢的含義。同時，「他也指責『全盤西化』的口號為荒謬。他相信，中國的傳統者真正的人文主義的價值觀念」²⁶。毛子水也稱：「我以為閱讀古來聖哲的著作，對於一個人的心志，時常有啟發和興感的作用。即就臺大而言，從三十八年度起，大一國文課程採用《孟子》為讀本，亦是本著這個意思而來的。」²⁷

事實證明，傅斯年的眼光確有獨到之處，在教學細節上，王叔岷是以校勘入手，咬文嚼字，讓學生充分體會中文文字之美。用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的話來講：「這種『母語教育』不僅僅是讀書識字，還牽涉知識、思維、審美、文化立場等。」這就達到傅斯年先生要求的務使學生「一進大門，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教他們的普通課」²⁸的目的，從而培養其人格和學術興趣。王叔岷自己評價說：「我教書，不拘泥舊說，常有新解，又有系統。改作文，有一句好，我都標出，頂批、旁批、總評，總是滿滿的，學生非常喜歡！常常與我親近傾談，無話不說，甚於家人父子。」²⁹王叔岷相當圓滿地完成了教學任務，不僅培養了很多人對文史方面的學術興趣，甚至還吸引外系的學生慕名轉投來中文系當學生，這其中的代表就是周富

²² 王叔岷：《辭讎學 辭讎別錄》，頁4。

²³ 同前註。

²⁴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王叔岷先生百歲冥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15年），頁571。

²⁵ 葉慶炳：〈四十三年如電抹〉，林文月編：《臺靜農先生紀念文集》（臺北：洪範書店，1991年），頁75-76。

²⁶ 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頁235。

²⁷ 毛子水：〈大學教育，經典和文化〉，《子水文存》（臺北：文星書店，1963年），頁146。

²⁸ 鄭吉雄：〈傅斯年先生傳〉，《國立臺灣大學校史稿》（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頁454-455。

²⁹ 王叔岷：《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頁79-80。

美³⁰。林文月後來回憶王叔岷上課和批發作業的情景，印證了這一幕：「王叔岷先生擔任我們的國文老師。王先生當時很年輕，教書認真，略微羞澀矜持，眼睛總盯著遠處天花板，他改我們的作文，一字一句清清楚楚，文後評語，時則幾乎另成一篇文章。猶記得發還卷子閱讀評語，總是充滿興奮期待。」³¹這是很了不起的，後來王叔岷的母校四川大學校長謝和平院士也說：「搞好教學不容易，因為它很具體、很細節，但又出不了驚天動地的、標誌性的突破。」³²

王叔岷拒絕過傅斯年為其作序，卻無法阻止傅口頭向別人推薦。一九五〇年底，錢穆訪臺，曾與傅相會，說道：「孟真與余暢論有關前清乾嘉學術方面事。」³³期間自然而然提到王叔岷的《莊子校釋》。而當時錢穆正在撰寫《莊子纂箋》，聽說後專程去找到《莊子校釋》以作參考，結果引用甚多，並給出「用力尤勤」的稱讚。王叔岷知道後，也投桃報李，在開設《莊子》課時，指定用《莊子纂箋》作教材，並曾撰寫〈錢穆先生的莊子纂箋〉³⁴。從此，王叔岷與錢穆之間又結下不解之緣³⁵。

傅斯年傾注在王叔岷身上的學術規劃應該是宏大的，只可惜沒來得及實現。在臺大，除了教學，王叔岷著述不斷，並受到傅斯年先生的鼓勵和幫助。「史語所初到新竹縣楊梅鎮，我伏在倉庫中寫好的《呂氏春秋校補》，交給傅先生看，傅先生認為可以出版。他說：『校勘的著作，應該自己繕寫，然後影印，才能保存原貌。如排印，排錯了，錯字多，反而不好。』當時臺灣既無出版新書處，更不必說影印手稿，傅先生處理臺大校務，在百忙中親自將先生的校稿，交給出版組一位優秀的

³⁰ 周富美即從外文系轉入中文系，後來成為王先生指導的研究生，畢業後留系，成為臺大中文系教授，丈夫張以仁是臺大和中研院史語所合聘教授，他們就是《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中記載在先生上世紀八〇年代初患胃病時送其上醫院的那對夫婦。

³¹ 林文月：〈在臺大的日子〉，《生活可以如此美好》（北京：龍門書局，2011年），頁29。

³² 據四川大學校長謝和平（1956-）院士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在四川大學「卓越教學獎」頒獎典禮上的講話。

³³ 錢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頁274。

³⁴ 王叔岷：〈錢穆先生的莊子纂箋〉，《自由中國》第7卷第1期（1952年），頁31-34。

³⁵ 在這之後，有王叔岷接替錢穆出任馬來亞大學中文系的客座教授，錢穆先生代羅雲平校長寫信邀請王叔岷到臺灣成功大學出任文學院院長，因王叔岷不做行政事務而作罷，兩人同在臺灣時，曾一道到楊家駱處看張森楷的《史記》五校、六校稿，之後錢穆邀請王叔岷到自己的素書樓赴宴。見《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和《王叔岷先生百歲冥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571 胡楚生先生的回憶。

書記，叮嚀他細心在石版上用蠟紙寫好油印，寫得很不錯，所以我這本《呂氏春秋校補》，列為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三十三，很特別，是油印本。傅先生愛護後進，真是無微不至」³⁶！

教學上，則在上好「大一國文」的基礎上，要求開設專業課程來突出其專長。「傅先生鼓勵我為中文系高年級開『校讎學』這門新課，我說：『清代乾、嘉諸儒，尤其是王念孫、引之父子，雖精於校勘古書，但無有系統的校讎學專著，我不敢教。』傅先生說：『你下過多年苦工，應該可以教。一面教，一面試擬新系統，應該再求進步。』」³⁷王叔岷認真思考教學內容，後來逐漸將自己的講義變成專著或文章，如由大一國文而來的就有《孟子校補》和《史記斟證》，以及《斟讎學》等。

王叔岷對自己學術方向的選擇，有自己的理由，「從前傅斯年先生創辦『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分歷史、語言、考古、民族四組，四組密切相關，歷史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文籍校定』。凡是最有經驗的學者，研究古書，第一步沒有不重視校勘問題的。研究學問重在大義，大義是由字句間得來。斟讎學是字句之學，是小學問，老子六十三章：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³⁸。

關於王叔岷堅持只做校勘的理由，還有一些旁證。據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的鍾彩鈞研究員對筆者講，史語所的張以仁研究員曾告訴他，傅斯年先生覺得校勘很重要，非常重視這項工作。「〔傅〕仍固守著清代的小學，他認為清代考據是中國學術中唯一充滿了科學精神和邏輯推理的一個分支」。當代著名學者羅志田教授在〈兩岸史學的現況與展望——羅志田訪談〉中，對傅斯年先生的學術建構，有這樣的評價：「整體而論，中國學者理解與詮釋中文史料的能力，大致還是比外國學者更有利的強項。傅斯年後來在史語所裏聘用了嚴耕望、王叔岷等青年學者，也大力提拔了四川的王利器等人。這些人，特別是二王的研究取徑，大致都是以基本文獻的考訂解讀為主，與史語所強調動手動腳到處找尋新材料的主導性學風大異其趣。由此可見，傅斯年在與西方學者競爭『東方學之正統』的努力過程中，雖刻意借鏡他人所長，鼓吹史料的擴大與徵集，卻也並未棄己所長，疏忽了文獻典籍的解讀與詮釋

³⁶ 王叔岷：《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頁 81。

³⁷ 同前註。

³⁸ 王叔岷：《斟讎學 斟讎別錄》，頁 13。

工作，也就是他後來說的，以『全漢的問題』來『建造中國史學知識之骨架』。」只是因為傅斯年先生過早逝世，沒有完成其領導的學術體系建設。

王叔岷在恩師過世後，並未繼承傅斯年的任何職務，卻很好地秉承那高貴的氣節，仍然兢兢業業地進行著自己的事業。他以自己卓越的學術功底，高產的學術著作，最被推崇和懷念的教學業績為基礎，拒絕在史語所受氣，奮而辭職³⁹。之後到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教書十六年，王叔岷在校勘學方面的弟子，著名學者鄭良樹後來總結：「港、臺學者赴新、馬漢學界擔任教席者，為數不少，然而，能像王師逗留這麼長久，並且貢獻這麼多的，恐怕沒有第二位。」⁴⁰

一九八一年，王叔岷隻身⁴¹回到臺北，在史語所繼續做研究，被臺大中文系復聘為教授。從此，一直在這兩個單位工作，「到一九九七年，因為『半年來，我手足麻木，行動緩慢，有陶公所謂：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之感』⁴²，方才正式離職。王叔岷因為這段時間教學任務相對較輕，而學術積澱日臻豐厚，幾部集大成之作在這段時間陸續出版甚至再版，將其推向事業的高峰」⁴³。有學者稱「先生終生從事古籍校勘與考論，功夫之深、識見之精，近百年來，一人而已」⁴⁴。王叔岷總共在大學教書四十八年，加上史語所做助理研究員的五年，教中學二年，一共高品質地工作了五十五年，是中國文人「勤志服知」的典型代表。同時，因為其高壽並能持續地從事學術工作，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王叔岷甚至成為傅斯年那一代人形成的民國遺風的活化石，成為第二代學人的典範。中央研究院院士，史語所前所長王

³⁹ 王叔岷：《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頁 91-92。但先生去南洋教書，在史語所實際是留職，去後又回來繼續任職。

⁴⁰ 鄭良樹：〈王叔岷教授與新、馬〉，《百年漢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7 年），頁 543-553。

⁴¹ 先生回臺灣沒有帶資產，也沒有帶傭人，實際上以先生當時的資產，他完全可以在臺灣購置比較好的住宅，並配置一個照顧生活的傭人，但先生對財產和生活完全不在意。這為其後來患胃病埋下了伏筆。其在新加坡就購置了一套與女兒女婿門對門的房產，以方便其每年暑期去度假，以及大陸來的長子、孫兒、孫女暫住。

⁴² 馬德五：〈江河水廣自涓涓——悼念王叔岷恩師〉，《傳記文學》第 94 卷第 1 期（2009 年 1 月），頁 116-121。

⁴³ 胡開全：〈王叔岷著述考〉，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主辦：《國學集刊》第 1 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 年），頁 464。

⁴⁴ 黃沛榮：〈王叔岷先生有關《說文》引經問題之創見——以《左傳考校》為例〉，《王叔岷先生百歲冥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7。

汎森回憶：「王先生教學、演講特有一種風味，我覺得有點像（古人）。他的演講跟我們受現代西方人的演講影響不太一樣，他的演講頗有古風，但我一時也很難形容。」⁴⁵

王叔岷一生勤於著述，「除詩作及回憶性等可歸入文學創作的書籍九部之外⁴⁶，出版的學術性專書二十四部、單篇論文二四五篇，論文扣除非學術性及收入專書者外，實際出版的單篇學術論文有五十二篇」，若依出版時間來序列其專書二十四部，共有：《莊子校釋》(1947)、《列子補正》(1948)、《呂氏春秋校補》(1950)、《郭象莊子注校記》(1950)、《斟讎學》(1959)、《劉子集證》(1961)、《顏氏家訓斟注》(1964)、《諸子斟證》(1964)、《陶淵明詩箋證稿》(1975)、《世說新語補正》(1975)、《文心雕龍綴補》(1975)、《莊學管窺》(1978)、《古書虛字新義》(1978)、《慕廬演講稿》(1981)、《史記斟證》(1983)、《校讎別錄》(1987)、《慕廬雜著》(1988)、《莊子校註》(1988)、《古籍虛字廣義》(1990)、《鐘嶸詩品箋證稿》(1992)、《先秦道法思想講稿》(1992)、《列仙傳校箋》(1995)、《左傳考校》(1998)、《慕廬雜稿》(2001)、《慕廬論學集》(2007)，而歸納其「論著涉及的學科屬性，若依《四庫全書總目》的分類，則屬『經部』者有：《尚書》、《左傳》、《論語》、《孟子》、《斟讎學》、『虛字研究』等。屬『史部』者有：《晏子春秋》、《史記》、《漢書》等。屬『子部』者有：《老子》、《莊子》、《列子》、《文子》、《管子》、《墨子》、《慎子》、《鶡冠子》、《荀子》、《韓非子》、《商君書》、《申子》、《呂氏春秋》、《淮南子》、《列仙傳》、《劉子》(北齊劉晝)、《顏氏家訓》、《世說新語》、《中說》(隋代王通)及先秦道法思想等。屬『集部』者有：陶淵明詩、《文心雕龍》、《詩品》、謝靈運詩、左思詩、曹植詩、林逋詩、《紅樓夢》等」⁴⁷。總體上王叔岷一生的學問，以校勘、斟讎學和莊學為主，但據其最後一名博士生、臺灣大學中文系趙飛鵬教授口述，王叔岷曾計劃晚年轉到其最初的興趣詩學上。當年傅斯年對王叔岷認識得深，還表現

⁴⁵ 王汎森：〈我所知道的王叔岷先生（王汎森在「紀念王叔岷先生百年華誕研討會」上的致辭）〉，蜀學研究中心主辦：《蜀學》第9輯（成都：巴蜀書社，2015年），頁273-274。

⁴⁶ 指先生所作《南園雜詠》(1981)、《舊莊新詠》(1985)、《寄情吟》(1990)、《倚紅小詠》(1992)、《論詩別錄》(1993)、《落落吟》(1993)、《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1993)、《隨感吟》(1997)、《慕廬餘詠》(2001)，詳見楊晉龍：〈引導與典範：王叔岷先生論著在臺灣學位論文的引述及意義探論〉，《王叔岷先生百歲冥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99。

⁴⁷ 同前註，頁84。

在既要壓制他的才子氣，同時又有所保留。「傅先生雖叫我洗淨才子氣，卻又贈我《四部備要》本王士禎《古詩選》一部六冊，及姚鼐《今體詩鈔》一部兩冊」⁴⁸。可惜在完成《鐘嶸詩品箋證稿》之後，王叔岷已經年近八十，未能再繼續下去。

二、二人生活上的相知相親，但交往卻又淡如水

傅斯年與王叔岷相處久了，師徒感情體現在很多細節上。這些故事經由王叔岷回憶，大大有別於其他人的描述，讓人對傅斯年有另一個新的觀察視角。在栗峰期間，傅斯年由重慶歸來，留所較久。王叔岷與其經常見面，對傅先生的為人處事有更多瞭解，益加欽佩。而傅先生跟他在一起也會自然地放鬆，並不像其他人眼中的睿智、嚴肅，而是一派天真和性情：「所中同仁都很清苦，很少肉食，有次傅先生在重慶籌得一筆小款，附一封信，託人帶回來分贈同仁，要職位低人口多的，分得多。因此職位高的就不高興，出怨言。傅先生附信中已經先提說：『你們分得這筆錢後，有的人一定大吃，有的人一定大罵。』傅先生就是這樣風趣。」⁴⁹

「所中每天下午五時晚飯後，大家都出來走走，遠見傅先生過來便跑開。傅先生告訴我：『他們看見我就跑，我很寂寞。』傅先生有時跟我聊天，忽然他不知說到哪裏去了，他歎道：『唉！我這個將死之人！』他的頭髮愈來愈白了，他說：『我沒有經過中年，由少年就跳到老年了！』傅先生衣著飲食，都很隨便，有次院中張家灑的綠豆，他走過那裏抓一把就吃。他的生活幸好有傅師母大彩夫人照顧」⁵⁰。要記述到這麼細是相當不容易的，因為王叔岷一生不喜歡交際是出了名的，即使是在李莊，他與人也交接甚少，甚至到了「老死不相往來」的地步⁵¹。

在臺灣，二人交往也很少，但感情卻是愈來愈深。「傅先生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就任臺大校長以來，生活艱苦，他說：『我這個校長，吃不飽，餓不死。』冬天，在報章雜誌上發表文章所得的稿費，做了一件新棉袍，很高興的樣子。傅

⁴⁸ 王叔岷：《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頁 47-49。

⁴⁹ 同前註，頁 56。

⁵⁰ 同前註。

⁵¹ 郭良玉〈史語所的幾位元先生〉中記錄有：「柴門口……一家是王叔岷，夫妻全是四川人，有一個女兒……雖住在一個院裏，幾乎毫無接觸，連話也沒有說過幾句，簡直是老死不相往來。」見《平庸人生》（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 207。郭良玉當時是先生史語所同事何茲全的夫人。

先生自己很苦，卻經常為臺大師生謀福利」⁵²。偶爾碰面，也是十分簡短。「臺灣學生受國內影響，左傾風氣特盛，學生到處貼標語，打倒學閥傅斯年。一日，臺大體育場集合千多人，高呼打倒傅斯年！正值傅先生乘車來校，時因過勞，血壓愈高。岷趨前曰：『傅先生，你要保重！』先生云：『出事了！』」⁵³在傅斯年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時，王叔岷還講了一件非常有趣的故事：「記得有次臺大文學院院長沈剛伯先生請傅先生夫婦晚餐，也邀我作陪。沈先生請客，沈太太都是親自下廚。傅師母雖是客人，也去廚房幫忙。傭人將香噴噴的燒肉端上桌，傅先生趕快搶著吃，說道：『快些給我吃兩塊，我太太不讓我吃。』因為他的血壓高，不宜吃肥肉。傅先生有時的言行簡直跟小孩一樣天真。正如孟子所說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⁵⁴私下交往，這似乎是二人最親密的一次。這是正面交往，雖然相親相知，卻保持著「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境界，並未出現人身依附的師徒關係，甚至沒有到家裏去拜望，或在傅過世後照顧師母的記載。

工作和生活中，王叔岷性格溫和，平素是與世無爭的，但如果聽到有人說傅孟真恩師的不是，卻會忍不住去理論一番。「他處事有擔當，有魄力，因此有些人批評他跋扈。我說：『表面上看來是跋扈，可是，傅先生的跋扈是為公，不是為私，是為人，不是為己。他捨己為人，不怕別人批評，這點要弄清楚。』批評他的人沒話說」⁵⁵。反之，在史語所，傅斯年經常以弟子用功的例子來鼓勵他人，「傅先生對王老師甚為愛護，常對他人說『你們應該有王叔岷用功的精神』」⁵⁶。

王叔岷的言行對當時的社會形成一定的影響。在臺灣，王叔岷是重塑臺大中文系風範的中堅力量。有韓國人金學主⁵⁷來讀書，奉王叔岷為他心目中從北大來臺大的五聖人之一，「不僅學問，而且為人，至今為自己的楷模；並認為，由於他們的到來，臺灣的中國文學研究水準一下子達到空前絕後的極盛狀態」⁵⁸。在馬來西亞和

⁵² 王叔岷：《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頁 85。

⁵³ 同前註，頁 76。

⁵⁴ 同前註，頁 265-268。

⁵⁵ 同前註。

⁵⁶ 林耀椿：〈懷念王叔岷先生〉，《中國時報》，2009 年 3 月 24 日。

⁵⁷ 金學主 (1934-)，韓國國立首爾大學校中文科教授，一九五六年畢業於國立漢城大學校中文科，獲學士學位並供職國立漢城大學校。一九六一年在臺灣大學國文研究所獲碩士學位，一九七五年在國立漢城大學校大學院獲博士學位。

⁵⁸ 五聖人還包括臺靜農、戴君仁、屈萬里、鄭騫。陳廣宏：〈韓國「漢學」向「中國學」轉型之沉

新加坡，王叔岷也對這裏貢獻頗多。新加坡政府對王叔岷的學問和業績非常認可，總理李光耀先生親自出面挽留，要給其「居留權」。對此，王叔岷淡然拒絕道：「我是中國人，我不會放棄中國國籍。」⁵⁹ 這種由樸素的愛國情懷自然而產生的做法，並不影響新加坡後來對他的評價：「這位桃李滿門的一代儒宗，在一九八〇年代國大中文系最困難的創系時期，毅然決然地拋開自己過去所堅持的『只管教務、不管系務』的想法，挺身而出主持系務工作，從而延續了新加坡華文高等教育的香火，對國大中文系乃至整個新加坡華文文化界做出了難以估量的貢獻。」⁶⁰

能做到這種成就，王叔岷作為在中文專業領域有大成就的學者，自然而然地具有一種以中文為根基的愛國主義情懷和民族責任感。這方面，先生雖然沒有什麼公開的大作專門述及，但身邊的弟子卻記得很清楚。「王師常說：『在本土之外，中華文化可以站得住腳的，恐怕只有這兩個地方⁶¹了。』」⁶² 這讓弟子感受很深，「他對當地的華社仍然非常關心，尤其是華族的文化和教育。他幾次向筆者說過：『沒有華文教育，就沒有中文系；沒有華文教育，就沒有華社。』」⁶³

王叔岷一生醉心於學術和教學，不聞窗外之事。由於一九四九年後是和平年代，他一直過著比較體面的生活，晚年獲得許多榮譽。「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二日，由臺大中文系編纂出版《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為先生壽，計集稿四十九篇，八十餘萬言。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應邀參加北京大學一百周年校慶，並在『漢學研究國際會議』閉幕致辭，會議合影時，王先生被安排在第一學人的位置。二〇〇〇年行政院文化獎頒給先生，文化獎是臺灣地區最高的文化榮譽獎項，亦為個人之終生成就獎。政府設立此獎之用意，是用以表彰對中華文化之維護與發揚有特殊貢獻之人士，先生獲得此獎，可謂實至名歸。二〇〇一年八月臺大中文系出版《王叔岷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研討會論文集》。二〇〇三年《史語所集刊》為先生

重一頁——日據朝鮮時期京城帝國大學的「中國學」研究及其影響》，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編：《韓國研究論叢》第12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268。

⁵⁹ 據王國簡口碑。另外拒絕的還有高薪，當時新、馬一帶教授的工資是臺灣的五倍，而王叔岷是講座教授，在那個基礎上還要高一倍，而且在住宿、祕書、用餐等方面還享受特殊照顧。

⁶⁰ 伍木：〈向王叔岷教授等杏壇先賢致敬〉，「新加坡文藝協會·文協作品·教學欄目」，網址：http://sgcls.hi2net.com/blog_read.asp?id=67&blogid=5332，檢索日期：2016年2月3日。

⁶¹ 筆者案：兩個地方指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⁶² 鄭良樹：〈王叔岷教授與新、馬〉，《百年漢學論集》，頁543-553。

⁶³ 同前註。

祝九十壽辰論文集（《集刊》第七十四本，此名器甚重，歷來僅三人）」⁶⁴。但對這些榮譽，王叔岷顯得很淡然，例如在二〇〇〇年，臺灣文化建設委員會為先生拍片子《王叔岷老師》，王叔岷作詩〈還我〉⁶⁵，表達的感受是這樣的：「人生如演戲，何事最可珍。舉手抑投足，時或不由人。汲汲於攝影，疑幻亦疑真。世情歸一笑，還我自由身。」獲獎後，「他將獎金六十萬元捐給臺大中文系作獎學金，以鼓勵後進。到二〇一四年止，王叔岷父女共向臺大中文系捐款達七百五十萬元臺幣」⁶⁶。

三、情感緬懷與繼承永繫於心

傅斯年不幸於一九五〇年去世，震動當時的政界和學界。「傅先生是不世出的天才。胡適之先生在為《傅孟真先生集》寫的〈序〉中，不到二百字的一段話裏，就用了十四個『最』字來稱讚傅先生，說他是『人間最稀有的天才』等等」⁶⁷。胡適的評價被廣為傳頌。王叔岷當然也寫有東西，而且很中肯，但流傳並不廣。「傅先生逝世，我也有一篇哀悼的短文：並世學有成者不乏其人，然多趨於鬻聲釣譽，未必有骨氣也；有骨氣者，又多流於孤介冷辭，未必有魄力也；魄力、骨氣、治學，三者兼備，其惟孟真師乎！孟真師之治學，如彼其博也！沾其餘馥，亦可以名家；孟真師之骨氣，如彼其高也！仰其餘風，亦可以立志；孟真師之魄力，如彼其雄也！揮其餘墨，亦可以砭俗……岷自一九四一年進北大文科研究所，至一九五一在臺大教書，追隨傅先生十年，為人、治學、處世，受益至深。平日偶翻檢傅先生所贈王士禎《古詩選》及姚鼐《今體詩鈔》，還有最珍貴的日本影印高山寺舊鈔卷子本《莊子》七卷，不禁感從中來，黯然紀之以詩：十年親炙副心期，孤島弦歌未忍離。點檢縹緗餘勳在，千秋風義憶吾師」⁶⁸！

王叔岷對傅斯年十年的培養銘記終生，不僅寫文章懷念傅斯年先生，在日常生

⁶⁴ 胡開全：〈王叔岷先生的「勤志服知」精神〉，《中共成都市委黨校學報》，2014年第3期，頁41-45。

⁶⁵ 王叔岷：《慕廬餘詠》（臺北：大安出版社，2001年），頁75。

⁶⁶ 胡開全：〈王叔岷先生的「勤志服知」精神〉，頁41-45。

⁶⁷ 何茲全：〈序言〉，布占祥、馬亮寬主編：《傅斯年與中國文化——「傅斯年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

⁶⁸ 王叔岷：《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頁85-87。

活中與人談話，也充滿對恩師的感佩，但他對恩師從事太多行政事務也有自己的看法，並身體力行地拒絕行政事務。「他這一生，唯一只佩服一個人，那就是傅斯年校長……王叔岷老師敬仰的是他在行政和學術上來回的遊刃之能，認為在這方面幾乎無人能出其右。然而他覺得，倘若傅斯年校長不把大部分時間消耗在行政上，則其學問就不止於如此而已」⁶⁹。

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王叔岷回臺灣，專程到臺灣大學傅園拜孟真師墓，作〈拜孟真師墓〉⁷⁰：卅年未敢負心期，翠柏蒼松節自持。朗朗鐘聲，遺訓在臺大傅鐘鑄孟真師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八字，鮮花一束拜吾師。

一九八一年六月，王叔岷回到臺北史語所做研究，住在蔡元培紀念館單身宿舍，研究室在傅斯年圖書館二樓。從此，中央研究院的人就看見一位長者從蔡元培館每日約八點步行到史語所研究室，「每天到傅斯年圖書館，總會在銅雕像前向傅先生行禮，精神日日與他恩師常在，下午四點固定回到蔡元培館，這是他不變的行程」⁷¹。「他早年就深受傅斯年的器重，所以傅斯年對他來講，對他的生命有很高的意義。因為王先生的研究室是在傅斯年圖書館裏面，我記得有一次，去傅斯年圖書館，看到王老先生對著傅斯年的雕像三鞠躬，再進去讀書。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他每天去研究室讀書，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鞠躬，順便向老師彙報他最近在研究什麼以及有些什麼成績。這樣的感情持續這麼久，非常令人佩服」⁷²。這種現象持續了近二十年（一九八一年至約二〇〇〇年）。

王叔岷從傅斯年處繼承的學識和情懷，感染了很多聽過他課、看過他的著作，接受過他指導的人。在這之外，王叔岷的名聲並不大，這實際上是對史語所傳統的堅守，即「新史家只將他們的同行，而不是普通民眾，作為預設的讀者。他們也盡量使自己與道德和政治事務保持距離」⁷³。這份高貴的知識分子情節與風骨，實際上也感染了很多與他有接觸的人。「王先生在中研院的時候，都是住在單身宿舍。早期是住在蔡元培館，後來就住在中央研究院單身宿舍，都是一個人。不過，有一群學生，他始終有一群仰慕者，始終都是追隨著他的，去照顧他，在週末去請他吃

⁶⁹ 辛金順：〈消失了的青山還在——悼念王叔岷教授〉，《聯合早報》第38頁，2008年9月19日。

⁷⁰ 王叔岷：〈紀事詩五首〉，《南園雜詠》（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年），頁29-31。

⁷¹ 林耀椿：〈懷念王叔岷先生〉，《中國時報》，2009年3月24日。

⁷² 王汎森：〈我所知道的王叔岷先生〉，頁273。

⁷³ 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頁91。

飯、去看他。我在學生時代，之所以去看他，也是因為跟著這樣一群人，我知道他有一大群『粉絲』。這群『粉絲』中，我粗略知道，包括中研院的兩個所，就是史語所，尤其是文哲所，還有臺大的文學院，都有很多『粉絲』⁷⁴。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王叔岷的〈古書的校釋問題（紀念傅故孟真先生八秩進七冥誕演講稿）〉脫稿⁷⁵。文中對恩師充滿敬意，「傅先生一生最尊敬最愛戴的前輩，是蔡元培先生，蔡先生的大度包容，容納一切，好比今之孔子。我們最尊敬最愛戴的前輩，是傅孟真先生，傅先生的大氣磅礴，充滿浩然之氣，好比今之孟子」⁷⁶。「傅先生是一個時代也不容易出現一個的偉大學者，也就是不世出的偉大學者，他的為人，有儒家的仁愛，法家的威嚴，墨家的刻苦，道家的恬淡。任何方面都值得我們崇敬和效法的」⁷⁷。在臺灣舉辦的有關傅斯年的紀念活動，王叔岷幾乎都參加，如寫〈倫敦博物館敦煌莊子殘卷斟補〉，收入一九五二年的《國立臺灣大學傅故校長斯年先生紀念論文集》；一九八八年的〈論「今本莊子乃魏晉間人觀念所定」〉（紀念傅故孟真先生九秩進三冥誕演講稿）；一九九六年的〈傅斯年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恭述所憶〉等。大陸方面舉辦有關傅斯年的紀念會，也曾邀請他，但他並沒有參加。「今年（一九九五）三月二十六日是傅斯年先生百歲誕辰。去年三月，大陸岳玉璽、李泉、馬亮寬三位先生已經合寫一本《傅斯年：大氣磅礴的一代學人》，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內容非常豐富。他們曾寄贈一本給我。今年六月，山東聊城地區社科聯、聊城地區傅斯年研究會、聊城市政府、聊城師範學院聯絡中國史學會、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系、山東省史學會、山東大學歷史系、曲阜師範大學歷史系、煙臺師範學院歷史系十個單位，共同商定十月上旬在聊城召開『海峽兩岸傅斯年學術討論會』，由籌備委員會馬亮寬先生來信邀我參加。我很抱歉，我沒有去。我想，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要出傅先生百歲紀念論文集，我已有文章。史語所又將同臺灣大學及聯合報文化基金會於十二月十六、十七、十八三日舉辦傅先生百齡紀念會，我就不必再到大陸去」⁷⁸。再之後的紀念會，因為身體原因，王叔岷已經無法參加了。

⁷⁴ 王汎森：〈我所知道的王叔岷先生〉，頁 274。

⁷⁵ 王叔岷：《斟讎學 斟讎別錄》，頁 559。

⁷⁶ 同前註，頁 547。

⁷⁷ 同前註，頁 559。

⁷⁸ 王叔岷：〈傅斯年先生百歲誕辰紀念 恭述所憶〉，《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頁 265-266。

除了這些公開的場合，王叔岷還寫了很多與傅斯年有關的詩。一九八五年時逢傅孟真先生冥誕，感慨恩師除自己天天鞠躬外，已經漸漸被人遺忘，作〈誰能〉⁷⁹詩紀念：（序）孟真師九十冥誕感賦。出入黌堂五十年，閱人多矣憶前賢。誰能去後長遺愛，卹下無譏歎逝川。

一九八七年九月五日，有弟子來信誇耀王叔岷高風亮節，他作〈何敢〉⁸⁰詩自謙：（序）寶春女弟來書，語稱岷之風範德澤，傳校長後一人而已。岷何敢當邪，孟真師逝世已三十七年矣。憂國憂民了此身，黌塵遺訓記猶新。明為日月浩為海，敢道吾師後一人。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王叔岷因朋友所托，為其珍藏傅斯年的題詞作跋〈景仰〉⁸¹詩：磅礴高昂似孟軻，豈甘無用任蹉跎。五千妙義如陳詠，王注虛浮未足多。

一九九〇年弟子們給王叔岷祝壽時，作〈祝壽〉⁸²：（序）四月廿七日（庚午四月初三日），生辰前二日，隆獻、美美伉儷寄贈祝壽錄音賀柬，晚間崇禮、翠英伉儷，人鵬、惠綿女弟，相偕至蔡元培紀念館，饋贈彩筆、鮮花、鳳梨等禮品，談笑間，聽岷細說傅故斯年先生生前主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及臺灣大學情事，乃大才小用，傅先生實天下才也。一曲清音市外來，寂寥孤館笑顏開。鮮花彩筆梨如鳳，細說當年天下才。

王叔岷的女兒，臺灣大學中文系王國瓔教授認為：「基於對傅斯年先生的感念，父親始終認為中研院才是他的『家』，雖然孟真先生已去世五十載，中研院也幾經變遷，不復當初。」⁸³王叔岷即便身處海外，撰寫的重要文章仍然寄往史語所發表，他一生前後共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發表論文九十九篇，為建所以來個人之最，另有七本專著列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王叔岷始終有居於中心地位從事中國主幹文化研究的自信，並在有「天下第一所」之稱的史語所終生任職，史語所也為其保留研究室和單身宿舍直至逝世。

⁷⁹ 王叔岷：《舊莊新詠》（臺北：華正書局，1985年），頁67。

⁸⁰ 王叔岷：《寄情吟》（臺北：華正書局，1990年），頁47。

⁸¹ 同前註，頁73-74。

⁸² 王叔岷：《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頁161。

⁸³ 同前註，頁282-285，附錄：王國瓔：〈淡泊名利之外，謹守規矩之中——我的父親王叔岷〉。

總結：王叔岷實踐了傅斯年的師徒觀

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沈寶春誇讚王叔岷「風範德澤，傳校長後一人而已」。師徒風采的傳承，甚至遠遠勝過學術的傳承。這也構建起一對近代中國另類的師徒典範。傅斯年曾撰〈中國學術思想界之基本誤謬〉一文，提到：「中國學術，以學為單位者至少，以人為單位者轉多，前者謂之科學，後者謂之家學；家學者，所以學人，非所以學學也……弟子之於師，私淑者之於前修，必盡其師或前修之所學，求其具體。師所不學，弟子亦不學……中國學人，每不解計學上分工原理……中國學人，好談致用，其結果乃至一無所用，學術之用，非必施於有政，然後謂之用，凡所以博物廣聞，利用成器，啟迪智慧，熔陶德性，學術之真用存焉。中國學人，每以此類之大用為無用，而別求其用於政治之中。」⁸⁴ 傅斯年對從事學術的師徒關係的態度，化為實踐，則在其與王叔岷的關係上做出了典範。

⁸⁴ 傅斯年：〈中國學術思想界之基本誤謬〉，《新青年》第4卷第4號（1918年4月15日），頁79-81。